

# 青海,作为诗歌的隐形支柱和能源

## ——罗鹿鸣诗歌的背景性解读

燎原

(威海市职业学院,山东 威海 264210)

[摘要] 罗鹿鸣诗歌写作中,青藏高原不仅是他诗歌的重要场景,也是他诗歌力量的隐形支柱。2012年以来,他重新写出了一大批高原题材的诗歌,它们形式单纯,意象清晰,气息通畅,其早年的尖锐与激越逐渐淡去,代之以诸多蹊跷的形而上意味和从容,关注着人生的价值困惑与意义虚无。

[关键词] 罗鹿鸣诗歌;青海;诗歌力量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2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4-117X(2014)06-0014-03

### Qinghai, as the Stealth Pillar and Energy of Poetry

#### ——Background Reading on Luo Luming's Poetry

LIAO Yuan

(Weihai Vocational College, Weihai, Shandong 264210 China)

**Abstract:** In Luo Luming's poems, the Qinghai-Tibet Plateau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cene, but also the stealth pillar of the power of his poetry. Since 2012, he has written a large number of plateau poetry with simple forms, clear images and unobstructed breath. The keenness and radicalness in his early times gradually fade and is replaced by a lot of strange metaphysical and sober words, focusing on the value confusion and meaning nothingness of life.

**Key words:** Luo Luming's poetry, Qinghai; power of poetry

在罗鹿鸣的诗歌履历中,青海高原是一个重要场景。这不仅因为他的青春之路和诗歌之路起始于斯,或人过中年后的今天,他的写作中重又凸起了一片高原,更因为诸多迹象表明,青海高原还是他诗歌写作的隐形支柱——一种调动、激发他内心能量的能源。

2012年以来,罗鹿鸣写出了一大批重回高原的诗歌,其中有一首题名为《这一年,那一年》:

那一年,我从湖的北岸经过

我是我父亲的满崽

我二十一岁

这一年,我从湖的南岸来看你

我是我女儿的父亲

她二十一岁

这一年和那一年之间

是一个时光的大湖

我所历的岁月

只是青海湖的二十七点波光

湖水永远那么冷静

时光已了无痕迹

记忆的潮水

噬咬着湖岸,湖岸

我听到了他泣不成声

收稿日期: 2014-05-23

作者简介: 燎原(1956-),男,陕西西安人,山东威海职业学院教授,主要从事诗歌批评和文化研究。

诗中的这片大湖，便是青海湖。而其中的这番表述，则带有明确的心灵自传性质。那一年，21岁的他，作为父亲最小的儿子（亦即湖南方言中的“满崽”），一个刚刚毕业的湖南大学生，途经青海湖的北岸孤身进入高原腹地，开始了自己激情而荒凉青春岁月；这一年，自己的女儿已经长到21岁，他选择湖的南岸重返故地时来到湖边流连。两代人同一个21岁的年华，在此时似乎有点巧合，但其间的时间流逝之快，人生变化的不可捉摸，则不能不使人为之感叹。而从彼时到此时，已经是整整的27年时光，这27年的时光于他是怎样走过来的？最初的憧憬与梦想，随后的坎坷与挫折，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喜悦，无疑让人五味杂陈。虽然他最终以有为者的姿态走了过来，但将这27年置放在更广阔的时间形态中来考量，则形同于从湖的北岸到南岸走了一圈，在浩渺的时光大湖中只留下“二十七点波光”。那么，时间到底是什么？人生到底是什么？人生的奋斗难道必将如此地归于虚无？念及于此，他突然禁不住地怆然泪下，“泣不成声”。

在我看来，这是罗鹿鸣一首重要的诗作。它形式单纯，意象清晰，气息通畅，其中两个“21岁”的并置与对照看似颇具匠心，但却更像信手拈来，浑然天成，是他进入中年人生之后，一首水到渠成的诗作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在此所触及到的，是人与时间的关系这一深层哲学命题，是人在这一关系探究中的惶惑，以及对于虚无的噬心体认。

这是一个突然让人陌生的罗鹿鸣。纵观他的诗歌历程，其中所显示的大都是激情的理想主义情怀，是伴随着他不断挑战自我的人生履历，对于自己的诗歌励志。其中充满了对于自己奋斗人生的自信以及必将实现人生价值的确信，却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关于人生的价值困惑与意义虚无。

与同代人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，罗鹿鸣步入社会的人生起点，既具有较明确的自我设计，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冒险性。1984年，衡阳师专历史专业毕业的罗鹿鸣，主动报名前往青海支边。对他而言，这在当时是一顶光环，而由此被有关部门所关注，以在未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，应该在他的想象之中。然而，接下来的现实能否吻合他的想象，未来的成长之路是否低于他的想象，这是无法预知的。我所知道的事实是，当时他没能留在省会西宁，而是被径直分派到了青海草原腹地的德令哈，做了一名中学教师。作为当年青海社会文化生活长期的亲历者和知情者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多

少有些让人失望的去向。因为同一时期的许多内地大学毕业生，大都进入了省会西宁的文化事业单位或者高校，并随后相继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。这其中就有此后调往上海，在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《水浒》的鲍鹏山。但据罗鹿鸣自己讲，青海省教育厅政治部的领导在他报到时，给他提供了5个留在省级机关的可选项，是他自己毅然奔赴西部之西的。也许，这种义无反顾的抉择，便是他人生自我设计的一部分，至今，仍留在了他诗歌的深处。

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/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”。德令哈现今以诗人海子的这首诗歌而闻名天下，但在当年，它的确就是“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”。而相对于这座城市中的党政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，中学教师则几近于这座荒凉的城中荒凉的职业。时年21岁的湖南满崽罗鹿鸣，此时是否感受到了荒凉与失落？而从若干年后的一首诗作来看，他应该是深刻地感受到了：“昨天死都死了，昨天/死在日月山的西边/那纹丝不动的骆驼泉/熄灭了青春的火焰”（《昨天与今天》，写于2014年5月）。

然而，青海以及德令哈，又有着另外一重巨大的精神文化气场和魅力。从时代大势来说，此时“振兴中华”和弘扬西部拓荒精神的时代主题，不但对诸多内陆大学生形成了一种召唤，也充分调动了他们实现自我的想象力——基于青海缺乏人才的前提，那么，人才在缺乏人才的地方无疑更容易成为人才。若干年后，罗鹿鸣这样表述了自己主动投身青海的初衷：“在故乡一些人的心中，我是一名英雄，其实，我是一个怯弱者。何以见得呢？美其名曰支边青海，内心里却是没有勇气面对家乡的人才竞争……”（这也正是我前边所说的，他“具有较明确的自我设计”的依据所在）毫无疑问，他的这番表述说得实在，而这篇文章的标题，就叫做《我的大实话》。但此后的事实表明，他也的确由此实现了自己的想象。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青海更是一个适合文学青年做梦的地方。早在1950年代，以作家李若冰的《柴达木手记》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作品，便以高原腹地的神奇风光和拓荒生活的浪漫，引发了诸多内陆青年的文学热望。罗鹿鸣的湖南老乡，此后成为大诗人的昌耀，当年就是出于对青海地理风物异域情调的向往，而主动投身于青海的边地大荒的。而1984年的此时，由新边塞诗发轫的西部诗歌正值大潮初起，并在整个中国诗坛激起持续的回应。此后的又一位著名诗人海子，先后于1986年和1988年，两度深入青海进而前往西藏，并于第

二次途经德令哈的数日盘桓中,写出了那首关于德令哈的著名诗篇《日记》。由此进一步推究,假若没有其他的外出事由,1988年7月的罗鹿鸣便应该与孤独的海子一起,共同处于那座“雨水中荒凉的城”之中。只是海子所要书写的,并非西部诗歌,而是大地与神性的诗篇。

另外一幅场景必须提及,这座荒凉的德令哈,又是青海省海西州的首府,也是聚集了自1950年代以来,由全国各地输入的专业技术人员、右派知识分子,庞大的农建师系统中的精英等等,青海省的第二大人才汇聚之地。这一时期,它还是与省会西宁相呼应的青海省的另一文学重镇。其中活跃着一大批时代文学潮流中弄潮的诗人作家,并创办了一份名为《瀚海潮》的文学期刊。不难想象,这家刊物不仅给罗鹿鸣提供了诗歌的试验场,也为他补充了诗歌的养分。

从以上的这样一幅大背景中,我们既可见罗鹿鸣此时的渺小,还能够想象得出,他在其中必然受到的感染、激励与锤炼。

综合罗鹿鸣的人生历程和诗歌历程来看,他对自己人生成就的期望值,显然要大于对自己诗歌成就的期望值;即便是此时投身青海的选择,出于成就诗歌写作的考虑,也小于他对自己人生成就的期望,这与昌耀当年的心理趋向显然不同。然而,19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,当诗歌成为一种时代的主潮并置身于这样浓郁的诗歌氛围时,罗鹿鸣毫不犹豫地纵身为弄潮儿,在成就自己有为人生的总目标下,他要以诗歌抒发自己的心灵思绪,要以诗歌为自己励志,还要让诗歌成为自己人生成就的一部分。诗歌于此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想象,他也因此而表现出极强的写作爆发力。到了1992年,在青海的同代诗人大都两手空空时,罗鹿鸣却连续出版了两部诗集。其一为《爱的花絮》,这是一部散文诗集,是献给自己的妻子与爱情,以及关于故乡的恋歌;其二为《我心在高原》,是一部典型的西部诗歌集,其中包含了青海以及之外的西部大地上山河、风土、人物、事件的广阔书写。“这一切的关于西部人文、西部现实和西部历史的描述与记写,都使我们感觉到那个来自南方校园的罗鹿鸣,于此一广袤时空中对自己视野的扩展和自身生命质量的递加”;“他以诗歌为媒介延伸扩展自己在那片大时空中的知觉域,又使之在返还中聚变为自身的精神

文化素养,兑现为诗。这因之而构成了一种循环传输形态,它辽阔着一个人,也沉淀着一个人,使其诗歌理想在这一循环中得以逐步地充注和实现。”<sup>[1]</sup>这是我当时应邀为这部诗集所写序言中的两段话,它当然也是我所感受到的事实。

但让人很难想到的是,罗鹿鸣于此已实现了其人生的跳跃式发展。他由中学教师而海西州政府秘书,而调入西宁,继而由团省委秘书而青海省建设银行干事。大约1995年前后,已调至威海数年的我突然接到罗鹿鸣的一个电话,说他目前在北京,被借调到了建设银行总行……如此快速频繁的人生位置迁徙与变化,实在让人惊叹。

这是缘自他的天资、情商因素吗?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那么,另外两重因素绝对不可排除,其一,青海高原基层生活对于他的锻打、锤炼,以及由此赋予他的底气;其二,诗歌给予他的能量。从某种意义上看,诗歌,几乎等同于他人人生前行的助推器,使他得以飞翔的另一只翅膀。所以,在必须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中断诗歌写作十多年后,当他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稳定期、松弛期,并在工作位置挪移至诗人昌耀的故乡——湖南常德这一特殊地域时,仿佛果真有冥冥中的天意点化,他突然感应到了诗魂附体,继而重又启动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旅程。

这是他诗歌写作的下半场。他诗歌的步履溯源而上,重走远方的青藏高原,力图再建一片诗歌高地,写出了一系列关于青海湖、关于藏地的诗篇,大有结集成书的架势。纵观这一部分新作,其早年的尖锐与激越逐渐淡去,代之以诸多蹊跷的形而上意味和从容,其情状颇似他重返青藏高原时所体味到的《一个喇嘛的行走》:“我在形而上地行走/我走得从容,且低着头/我的一切写在红袈裟上/我的内心也如瓜剖/还要红墙何用?/还要白墙何用?/还要黑窗何用?/还要金轮法幢何用?/我只管行走,且低着头”。

这是体会到了人生的虚无感之后所转换出的平常心,一种脚踏实地的淡然与从容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燎原. 通向高处的人生[N]. 文艺报, 2005-11-10.

责任编辑:黄声波